

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

知识与价值

成中英新儒学论著辑要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成中英新儒学论著辑要

知 识 与 价 值

李翔海 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识与价值：成中英新儒学论著辑要/李翔海编.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 12
ISBN 7-5043-2814-6

I. 知… I. 李… III. ①新儒学-研究-中国-文集②成
中英-新儒学-文集 N. B24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21834 号

知识与价值

——成中英新儒学论著辑要

李翔海 编

责任编辑 罗林平

责任校对 陈丹桦

封面设计 李 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武庙二条九号 邮政编码 100856)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大 32 19 印张 406 (千) 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43-2814-6/G · 1057

定价：21.50 元

(京) 新登字 097 号

《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方克立

副主编 张品兴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克立	宋连昌	宋志明	余新华
张品兴	罗林平	郑大华	郑家栋
高聚成	徐少锦	焦树安	

总 序

五年前，“现代新儒学”或“现代新儒家”对于人们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名词；在今天，它们不仅已经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我们的报刊上、书册中，而且迅速地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新热点。

现代新儒学本来是 70 年前就已经在中国大陆产生、经过了 30 年奠基和发展的一个学术思想派别，它的前期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都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解放后，作为一个思潮和学派来说，因其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而不可能在大陆继续存在和发展，它的阵地遂转移到了港台和海外。而就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史来说，现代新儒学并没有断绝薪火，在第二个 30 年它又经历了新的重要的发展阶段，进入 80 年代以后更有进一步走向世

界、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性思潮的趋势。由于海峡两岸隔绝 30 多年,国内的读者对这些情况均难以知悉,并在一再“批儒”的气氛中对这种思想感到十分隔膜。

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域外的各种思潮蜂拥而入,这种本来就是在中国土地上产生,并以维护中国民族文化精神为旗帜,以解决传统和现代化、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为宗旨的思想学说,自然不会放过回归本土的机会。主要是通过一些海外华裔学者的努力,积极推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儒学复兴”说在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化讨论中俨然成为了一派显学。文化讨论的现实感受加并不遥远的历史的回顾使人们很快地接受了“现代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家”的概念。

关于现代新儒学,现在人们谈论得很多,但是由于研究刚刚起步,资料掌握还很不齐全,特别是对于港台和海外的新儒家学者,研究资料尤其匮乏,因此人们的认识难免是笼统浮泛的、很不一致的,包括现代新儒家的对象、范围、代表人物、发展阶段、思想特征、历史评价等问题,在认识上都颇多歧义。至于更深层次的问题,诸如现代新儒学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开新,对近现代西学的融摄和“儒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敌视和某种意义上的启示;这个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派别是怎样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在许多共同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的,它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贡献是什么而限制又是什么,它将会有怎样的发展前景,等等,都有待于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逐步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才有可能作出切实的回答。

对于一切研究者和关心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人来说,占有最基本的研究资料、原原本本地弄清现代新儒家学者都写

了和说了些什么乃是首要的前提。为此我们编辑了这套“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旨在为广大读者提供一套精选的系统的研究现代新儒学的第一手资料。它不同于国内已经出版的众多新儒学评论集、港台海外新儒家论文选集和新儒家个别著作的重印本，而是力图从反映整个思潮发展的角度，将现代新儒学各个阶段代表人物的主要代表作挑选出来，分别汇编成册，以便读者准确地把握其新儒学思想的实质及其个性特征。为了帮助青年读者正确认识复杂的思想文化现象，各册编者分别撰写了“编序”，除了介绍一些基本情况外，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有关思想资料作了初步的分析和评论。

读者可以看到，我们是采取了广义理解的“现代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家”概念，即超越了新儒家学者之间的师承、门户之见，把在现代条件下重新肯定儒家的价值系统，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的那些学者都看作是现代的新儒家。这套“辑要”所选的15位作者，涉及“五四”以来的三代人，他们之间的个性差异是相当明显的，但是都不乏上述“共性”。他们中的马一浮、方东美、余英时、成中英等人，能否归属于现代新儒家的范畴，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看法。这里提供了一批反映其新儒学思想倾向的资料，特别是集中反映其现代新儒学的文化观和哲学思想，希望有助于对他们的思想特质和精神方向作出符合实际的定性判断。当然这决不是说，他们的思想不可能包含矛盾，不可能表现出多样的形态，但这些资料至少对了解他们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是有帮助的。

我们研究现代新儒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对“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论争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作一种简单的是非评判，更重要的是为了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探索一条更有效的、更切实可行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可动摇，怎样更好地结合中国的国情，更好地利用我们传统的资源，怎样更好地吸收别的国家现代化成功的经验和域外一切先进的思想文化，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成为包容性最大的、最富有民族特色和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索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以宽阔的胸襟和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一切致力于民族振兴、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并且也确实在某一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的思想派别，包括那些曾经批评和反对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派别。他们的思想主张中哪怕只包含着片面的真理，也应该加以厘清，加以肯定，批判地借鉴和吸收。现代新儒学在维护和弘扬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批判民族虚无主义、融合中西哲学和文化、探索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道路等方面确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份思想财富我们就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总结和批判地继承。所以，这套“辑要”决不只是为读者提供一套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而应该看作是中国人的现代智慧的一部分，是一套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名著。所选15位作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都堪称名家，把他们的代表作称为“名著”并非言过其实。当然，“名著”中所写的不见得都是真理，我们也不赞成“复兴儒学”的观点，但是完全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有影响的思想学说来研究，包括它的错误亦能给人某种启迪。如果大家能同意这个看法，那么出版这一套书的价值和意义也就

是不容置疑的了。

方克立

1990年11月8日

编 序

作为中国现代三大主流思潮之一，现代新儒家已经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七十年的历程。而今，第一代、第二代新儒家大多已经故去，活跃在海内外学界的多是新儒家的第三代传人。有如其前辈，第三代新儒家在学术见解上也是差异互见的。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点：大都有着深厚的西学功底，力图在中西哲学的对比中深刻反省儒家哲学传统的基本特性；从主观愿望来看，都能以推进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为职志。其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台湾、香港以及大洋彼岸的美国，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成中英教授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成中英，祖籍湖北省阳新县，1935年出生于南京。他生长于“书香世家”，其父自小就精读古书并治旧学。1949年前，成中英先后在重庆、南京读小学、初中。1949

年底随其父去台湾。1950年至1952年修完高中。195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同年破例以外专业毕业生考取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研究生。1956年底赴美留学，就读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58年进入哈佛大学继续深造，1963年7月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后长期任教于美国夏威夷大学，现为该校哲学系教授。

成中英具有西方哲学特别是现当代哲学的深厚素养。他自认：“在哈佛的五年中，我的哲学生命受到了西方哲学最严格的陶冶和锤炼”，因而“深入了西方哲学的核心”。^①但是，作为一个现代新儒家学者，他所走过的学思历程则是一条力图“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以重建中国哲学”的道路。二三十年来，成中英一直致力于推进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他不仅创办了英文《中国哲学杂志》（季刊），而且是国际中国哲学会、国际易经学会的主要创办人和领导者。80年代中期以来，成中英多次来中国大陆讲学访问，成为大陆所熟知的海外著名华人学者之一。为了扩大中国哲学在国际上的影响，促进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推进中西哲学的相互交流融合，成中英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本体诠释学”的提出，力图在“世界哲学”的背景下尝试着重建中国传统哲学，则是成中英现代新儒学思想的理论特色之所在。

作为一个自小饱受中国传统的熏陶而又深谙现代西方的

① 成中英：《世纪之交的抉择》，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98页。

时代精神、身处异域文化之中而又力图重建中国哲学的现代新儒家学者，成中英十分注重面对中西哲学发展之大势进行整体性的思考。正是在中西哲学的互诠互释中，他创立了自己颇具理论特色的学说——本体诠释学，力图以之为理据，来比较中西哲学传统，并进而创立未来人类整体的“世界哲学”。

与科技文化的世界化相呼应，“当代哲学的趋势是中西互诠与互释。这是一种比较的方法。它先求其异，后求其同，再彼此相互解释，最后趋向于一个整体哲学的观念和系统”^①。“本体诠释学”正是中西哲学互诠互释的时代产物。何谓“本体”呢？成中英解释说：“吾人对‘本体’的意义，可以归纳出以下两点：第一，‘对象的意义’，即将‘本体’视为一种对象，是实在的东西。第二，‘验存的意义’，即体验的存在，是主观和客观同时结合的感受。”^②“对象意义”下的本体，主要表现在西方哲学中，“验存意义”下的本体，则在中国哲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综合两方面，可以认为，“本体”具有根源、本源和整体的意思。^③ 诠释有别于解释：“解释是用科学法则来解释某种现象。诠释是基于一个本体意识来了解一种现象。了解不同于基本法则的知识，了解是意义的问题，是评价的问题。意义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含义，一个是价值判断，对于意义的说明，……所以，诠释同时也包含了意义的说明。含义的说明是指在不同的存在层次里，去表现知识或

① 成中英：《世纪之交的抉择》，第10页。

② 成中英：《方法概念与本体诠释学》，载《中国论坛》第217期。

③ 参见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258页。

者反映存在的知识的概念系统的内涵，同时相对于其它层次来显明它的价值结构。”^① 概而言之，解释导向知识，诠释则导向价值。本体诠释学则“既是一种整体哲学，同时也是一种方法哲学，更是一种分析和综合的重建（再建构）的方法。”^② 从其思想源流来看，它正是中西哲学交汇融合的产物。

整个西方哲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对方法的寻求。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有知识的倾向，希腊人素来就执著地追求知识理性。知识理性与方法意识密切相关，于是就从求知导致对方法的寻求。一方面，方法产生了新的知识系统；另一方面，知识系统又反过来限制了方法的运用。当知识限制了方法时，就要求对方法进行反思，设法创造出新的方法。因此，西方哲学中的方法意识非常强，每一个哲学家都以方法的鉴定开始其哲学思考。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整个西方哲学都突出地表现了对方法的追求。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也首先表现为方法的突破。

但是，哲学并不等于知识。当理性知识化以后，必然要趋向于一个价值目标。它要把客观的知识与主体的价值联系起来，并基于文化、经济、历史和生活的需要，而作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诠释，以对知识作出相应于价值和知识的整体性解释，并把知识当成整体价值，以评价其是否适应人的需要。在西方哲学中，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基于西方主知哲学的认知，但也基于主知的理性主义所建构的知识

① 参见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275页。

② 成中英：《世纪之交的抉择》，第70页。

宇宙，如何安排、接纳人的意志及价值活动，则为严重的问题。”^①西方近代哲学逐渐重视价值问题，这就促成了现代哲学的诠释化。“无论是英美哲学，还是欧洲哲学，都体现了诠释化的倾向。”一个集中的表现就是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诠释学的兴起及其影响的扩大。^②

诠释学在西方哲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诠释(hermeneuein)本是希腊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信息的传递和解说。它来源于希腊神话中关于Hermes的传说：Hermes是希腊神话中专司向人传递诸神信息的信使，他不仅向人们宣布神的信息，而且还充任解释者的角色，对神谕加一番注释和阐发，使诸神的意旨变得可知而有意义。与此相关联，诠释学最初只局限在基督教神学的经典解释范围内，成为《圣经》研究的一个分支。因此，诠释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可以称之为“文本诠释学”，其目的在于对重要文献文本的诠释，类似于中国传统的训诂。诠释学发展的第二阶段的代表是18世纪德国神学教授施莱尔马赫，他把诠释学扩大成为解释宗教经验、美感经验的学问，从而为诠释学开辟了一个新传统，并极大地影响了诠释学的近现代走向。诠释学发展第三阶段的代表是德国哲学家狄尔泰，他把诠释学应用到人文科学，认为诠释应该成为整个人文科学的方法论。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尽管诠释学在其发展中终于赢得了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地位，成为认识论上的重镇，一如西方其他的传统哲学流派，它也表现出对方法与知识的热

① 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第224页。

② 成中英：《世纪之交的抉择》，第23页。

切关注，关于整体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则被抛在一边。进入本世纪以后，诠释学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法国当代著名诠释学家保罗·利科尔把这个转折称之为诠释学发展史上“第二次哥白尼式的革命”。

这一革命的发起人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是从对传统哲学形上学的批评中，开始建构他的诠释学理论的。海德格尔认为，在传统形而上学中，对“存在”的了解是基于所谓客观现实性或工具性的思考而决定的。它并不能真正掌握整个语言所启示的主观意义以及人的存在具备的体验。海德格尔的这种批评是从人之存在的实质内涵出发的，这种人之存在的实质内涵是由人对生、死与时间等问题的关切与体验而来的。海德格尔认为，这些“人之存在”的问题，科学是无法完满解决的，因此，我们必须关注人的价值与意义活动的安顿。如何才能把哲学领回到探求生存意义的道路上来呢？海德格尔指出：“思作为思须在思一切之前先思在的真理”。^①所谓“在的真理”，也就是“在的意义”问题。因此，哲学的基本使命是追问“在”的意义。而“在的意义”只有通过“此在”即“人的在”才能显示出来。所以，此在对在的意义的询问也就是此在对在的理解，因此，理解成为“此在”的在的根本方式。

海德格尔“此在的诠释学”，对当代诠释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诠释学开始一反传统的知识论走向，在本体层面关注人的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创立了当代哲学诠释学，他继承并发展了海德格尔的诠释学思想，把诠

^① 《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9页。

释学本身当作哲学来对待，以人生在世、人与世界最基本的状态和关系作为理论体系的中心问题，从而确立了诠释学作为一种以理解问题为核心的哲学的独立地位，并使之成为一股涵括传统、历史、文学等诸多领域的当代思潮。在西方当代哲学对“意义”的探寻中，诠释学无可争议的处在中心位置。

然而，哲学诠释学依然带有西方哲学传统所固有的特点。由于对方法的注重，分析性成为西方哲学思考方式的根本特点，它所注重的是分析的差异，因而知分而不知合成为西方哲学的固癖。尽管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哲学诠释学“代表了重视相互融合、相互沟通和重新组合的思想方法”，因而表现出分中求合的倾向，但究其根本处而言，它仍然没有冲破传统西方哲学知分而不知合的固癖。

在成中英看来，海德格尔哲学依然缺乏联系的观点与整体的观点，没有揭示出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动态关联。由于他局限于对个体存在的研究，而个体的存在总是要面对死亡，因而他把人的存在与时间的关系仅仅看成是主体时间。但是，死亡真正意味着什么？死亡之后又是什么？作为此在，人投入到现在去作决定，整个人类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海德格尔哲学中悬而未决的问题。伽达默尔尽管坚持了联系的、动态的哲学思考，因而在某些方面对海德格尔哲学起了纠偏的作用，但也依然表现出了知分而不知合的缺失。他明确宣称：哲学诠释学不是为了给人文科学提供一种方法，而是为了正确揭示真实的存在，因而他要舍方法而求真理（本体）。尽管他一反西方只重方法而忽视本体的偏失，但分裂了本体与方法则与西方传统同出一辙。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另一个问题在

于：他过于强调传统占有人的存在的先在性，对于历史与传统发展中创造性的来源问题并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因而难免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矛盾。^①

本体诠释学正是当着整体理性“面临着本体与方法之间相互排斥、相互需要的矛盾而提出的整体思考”。^②而这种思考又是“根植于中国哲学的观念之中，尤其是根植于强调整体作用的《易经》哲学之中”。^③不同于重分的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基本智慧在于能合。中国人重视整体的合谐，其本体是一个整体，而不同于西方哲学中概念限定的本质。在中国哲学中，方法与本体是动与静的关系。本体相对于方法是静，方法相对于本体是动。同时，方法是显，本体是隐。一动一静，一显一隐，过程和结构互融，部分和整体互动。这种思维方式主要来源于《易经》哲学：“中国哲学正是强调完整性、变动性和内部转化。代表这个潮流的就是《易经》哲学。《易经》本身包含了内在的理性，也包含了内在的本体意识。它肯定一个变动的不变与不变动的变，它要肯定一个全体大用和一个整体一元。……在体与用上，在方法与本体上面，恐怕再没有一种哲学有《易经》那样的灵活性、生命性。”^④

本体诠释学既汲取了中国哲学的智慧，同时又力图超越重分的西方哲学与重合的中国哲学。从中国哲学的整体意识

① 这一部分引述了成中英教授 1992 年 6 月 19 日与笔者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谈话的部分内容。

② 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第 281 页。

③ 成中英：《世纪之交的抉择》，第 83 页。

④ 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第 283—284 页。